

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田正平 杨 晓

(浙江大学 教育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民国初年, 在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领导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确立了新的教育宗旨, 制订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 力图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 改变价值取向的单一。这一切不仅在指导思想和学校制度层面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 而且在实践层面有力地促进了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的发展, 使清末以来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的局面得到较大改变, 初步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教育体制。

[关键词] 辛亥革命; 中国教育; 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2)01-0005-09

发生于 90 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它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诞生, 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1912 年 1 月 1 日,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指出: “临时政府, 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的任务是: “尽扫专制之流毒, 确定共和, 以达革命之宗旨。”^[1] 夺得了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与封建专制主义决裂、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新中国的高昂精神, 为民初的教育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同年 1 月 3 日, 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1 月 9 日, 教育部正式成立。至 1913 年 9 月“二次革命”失败, 不到两年间, 蔡元培和他的后继者在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 顺应社会发展潮流, 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一、采取紧急措施 稳定全国教育秩序

当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在南京碑亭巷借来的三间仄隘简陋的办公室里规划民国教育发展蓝图的时候, 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 当时正值战争时期, 南北尚未统一, 各地军队占据校舍和教育机关房屋的状况多有所在。京师大学堂师生星散, 清华学堂已停课半年。即使是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南京, 也有几十所学校和江南图书馆等重要文化教育设施不得不由陆军部派兵士予以保护。兵燹之外, 教育经费的求告无门, 更使各级学校如雪上加霜。因此, 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争而中断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正常秩序, 稳定全国大局, 成了民国教育部的当务之急。

1912 年 1 月 19 日,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 条), 其重要内容包括:

[收稿日期] 2001-05-28

[作者简介] 1. 田正平(1944-), 男, 山西应县人,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及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 2. 杨晓(1954-), 女, 辽宁大连人,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和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

(1)清末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2)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3)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禁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4)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5)注重小学手工科(6)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7)初等小学算术科自第三学年始应兼课珠算(8)中学不分文、实科(9)中学及初级师范学校修业年限由五年改为四年(10)清末各学堂奖励出身制度一律废止^[2]。同时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则进一步规定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各学年教授科目、每周教学时数及各级学校的暂行课程表。正如教育部在电文中所指出的,颁发上述《暂行办法》和《暂行课程标准》,是有鉴于战争中各地教育省“自为令,不免互有异同,将使全国统一之教育界,俄焉分裂,至为可虑”的状况^[3]。此后,教育部分别就社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等通电各省,要求尽快整顿教育秩序,清除专制制度的影响。

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为稳定全国教育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是卓有成效的。一时,受战争影响而停课或关闭的学校得以迅速恢复,大批新学校纷纷建立。据统计,1912年,全国学校数达87272所,学生数达2933387人,与1909年相比,学堂增加近28000所,在校人数增加近130万人。而上述措施中所体现出的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如废止小学读经科、废除奖励出身制度、社会教育要注重宣讲共和国之权利义务及“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等等,已成为民国教育的基本原则而得以保留。

二、颁布民国教育宗旨 培养共和国新国民

由于政体的变革,清政府所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显然有悖于时代潮流,提出和颁布新的教育指导方针是关系到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大事。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专制时代教育与共和时代教育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而后者“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他批评清末教育宗旨的“忠君”与“尊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4](p.130)。主张民国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为方针,并对上述“五育”的内涵作了详尽说明。蔡元培的意见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教育界、文化界人士纷纷著文与总长商榷、质疑,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价值取向问题的大讨论。同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通过了民国教育宗旨。9月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之教育宗旨。除世界观教育未被采纳外,蔡元培的其余四项主张均得到反映。

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产生以来,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二个教育宗旨。与清末教育宗旨相比较,虽然前后仅相差6年时间,但其内容却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就形式方面而言,道德教育仍被放在第一位,但是“忠君”、“尊孔”这两条最能体现封建道德教育以至整个传统封建教育特征的核心内容被取消了。蔡元培所标揭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被奉为新时期道德教育的圭臬。实利主义教育与军国民教育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从清末教育宗旨延续下来的,然而却被赋予了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收复国土、抑制军阀割据的新的时代精神。美感教育的提出,尽管在当时受到冷落,但是,它的最终被列入教育宗旨,不仅体现了蔡元培个人的高瞻远瞩和理想化的个性特点,而且反映了在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后,个性的张扬、个人价值的受到重视已经被提到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上。这个宗旨的形成和颁布,标志着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中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它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为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虽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还会出现反复,但是,它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迫切愿望、重视实用知识的积极态度、突出个性发展的民主意识等等,却被以后的历史一再证明代表了近代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三、经纬万端,必先以规定学校系统为入手之方法

早在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通电中就曾指出：“民国既立，清政府之学制，最必须改革者。”至于完全新学制，当征集各地方教育家意见，折衷厘定，正式宣布。^{〔3〕}为了广泛征求全国教育界意见，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3月间发表了《拟议学校系统草案》，其前言称：“本部自成立以来，深维教育行政，经纬万端，必先以规定学校系统为入手之方法。承海内教育家投以意见书，积久盈尺，因归纳各家意见，并参酌列国成规，拟就第一次草案，继加修改，成第二次草案，最后成第三次草案。现在所拟新学制，即以第三次草案为标准。惟集思可以广益，讨论不厌求详。用特将三种草案，先登报端，以供教育家之研究^{〔5〕}。”

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学制问题是重要议程之一。经过热烈的讨论，形成并通过了《学校系统案》。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因1912年农历是壬子年，所以亦称《壬子学制》。此后，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实业学校、师范教育及大学的有关法令规程。1913年（农历癸丑年），教育部将《壬子学制》与这些法令规程的内容互相补充，形成《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规定：普通教育整个学程为18年，分三段四级：初等教育7年，为第一段，分为两级，初等小学4年，男女同校，高等小学3年，男女分校。中等教育4年，为第二段，男女分校。第三段是高等教育6至7年，分预科、本科。预科3年，本科3至4年。学前儿童入蒙养院，大学毕业后入大学院，肄业年限不定。除上述小学、中学、大学组成的学校系统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前者预科1年，本科4年；后者预科1年，专修科2至3年，本科3年，研究科1年或2年。实业教育分甲、乙两种实业学校，前者预科1年，本科3年；后者本科3年。《壬子癸丑学制》的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1922年。

四、遴选人才，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

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吸收各方面新式人才组成的教育部，是摆在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面前的重要任务。蔡元培主张办教育部当与办社会事业一样，要“为事择人”；“能者在职”。蔡元培及其继任者主持的民初教育部在人员构成上的最大特点，是归国留学生成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核心力量。蔡元培本人是结束了四年留德生活受命主持部务的，担任其副手的是景耀月。景耀月（1882—1944），山西芮城人，字太昭。1904年赴日留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2年初被任命为教育次长，3月22日辞职。接替景耀月任次长的是范源濂（1874—1927），湖南湘阴人，字静生。1898年自费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政法大学，回国后任学部主事、参事官。1912年7月，蔡元培辞职后，范源濂被任命为民国第二任教育总长。担任范源濂副手的是董鸿祜。董鸿祜，浙江仁和人，字恂士。1901年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06年参加学部游学毕业生考试，录取中等，授政治科举人。继范源濂兼署教育总长一职的是刘冠雄。刘冠雄，福建闽侯人，字资颖，福建船政学堂第三届留欧学生。1885年赴英学习海军，1912年被任命为海军总长，1913年1月兼署教育部。第四任教育总长由陈振先兼署。陈振先（1877—？），广东新会人，字铎士，早年留学美国，攻读农业。民初任农林总长，1913年3月，继刘冠雄后，兼署教育总长。第五任教育总长是由次长升任的董鸿祜。这样，在民初的教育改革中，担任教育部总长、次长的八人次（实际上是六个人）全部为有留学经历者。换言之，留学生在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中，处于无可争议的指导者、决策者地位。与清末学部的最高决策层次相比较，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从教育部所属各司、科人事安排看，这种特色也十分明显。1912年5月，在北京组成的教育部由一厅（承政厅）、三司（普通、专门、社会）和三位参事组成，不包括总长、次长共73人。

据蔡元培讲,这七十多位部员“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6〕(p.360)。从现在收入《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的许多电文可知,在组织教育部过程中,蔡元培吸收归国留学生参加部务工作的意识非常明确。4月22日,致电范源濂、周树人(鲁迅)等:“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上,为盼”。上海《民立报》在发表这段电文时特加大字标题:“教育部求贤若渴”。电文中提及的26人中,可考的有留学经历者即占半数以上。范源濂提出的人选,大多为具有实际教育行政经验者,主要是原在学部任职的中下级学务官员。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人仍以有留学经历者为主。这样,民国初年的教育部事实上成为东西洋归国留学生的大本营,在蔡元培“能者在任”思想指导下,聚集了一大批思想新、有学识、积极肯干、朝气蓬勃的热心教育人士,形成了民主、高效、廉洁、认真的办事作风。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评论说:“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已确有规模。……俨然有建设气象。蔡鹤卿君富于理想,范源濂君勤于任务。总次长实具调和性质,亦各部所未有。”〔7〕(p.17)鲁迅也曾回忆道:“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8〕(p.47)时论对民初教育部革新气象、建设气象的赞誉,从一定意义上讲,与当时主持部务时间最久的蔡元培、范源濂二人“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的抱负和道德风范有极大关系。1912年4月,蔡元培邀请范源濂担任教育部次长时,与范源濂有一段推心置腹的谈话,从中可以看出两位归国留学生为民国教育基础的奠定所表现出的“公忠体国”的精神。蔡元培说:

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国民党里并不是寻不出一个次长,我现在请先生作次长,也不是屈您作一个普通的事务官。共和党随时可以组阁,您也可以随时出来掌邦教。与其到那时候您有所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您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了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9〕(pp.159-160)

通过上面关于民国初年教育总长、次长以及教育部构成人员的谱系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革故鼎新的历史性大变革时期,领导全国教育改革除旧布新的核心力量,正是以蔡元培、范源濂为首的一批归国留学生和由他们援引的一批教育界进步人士。顺着这条思路,我们再就民初教育改革的几个方面,具体考察一下这一群体所发挥的作用。

1912年9月2日颁布的民国教育宗旨,如前所述,是以蔡元培所提出的五育并举的方针为基础制定的。而蔡元培倡导的五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与世界观教育三者的酝酿、形成以及对其内涵的阐释,都与蔡元培本人的留生活紧密联系。留欧期间耳闻目睹的切身感受,使他对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贡献有了深刻理解,这正是他提出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公民道德教育内容的思想渊源。留德期间对康德、叔本华美学理论的酷爱和钻研,构成了他美学思想和美育理论的基本框架。在来比锡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的比较研究萌发了他提出世界观教育的动机。不仅如此,即使在教育部的官制设置以及一些政策法规的制订过程中,留生活所带给蔡元培的影响也明显地反映出来。其中最为后人所乐道的是民初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设置。清末学部由五司组成: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蔡元培在总长任内改五司为三司,于普通、专门两司外,增设社会教育司,分管宗教、礼俗、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通俗教育、讲演会等事项,聘请周树人、王章佑、樊炳清(以上均为留日学生)、齐宗颐(留德学生)等任科员。蔡元培主张设立社会教育司,是因为他在欧洲多年,深感各国社会教育之发达,而我国年长失学之人占全国大多数;为提倡补习教育、民众教育起见,于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10〕(p.311)。民国初年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是我国社会

教育在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确立地位之始。

在民初制定的各项教育法令规程中,蔡元培较多关心的是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问题,他常谈起与范源濂的一段有趣对话:我与次长范君静生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10〕(p.197)蔡元培关于高等教育的意见主要有:取消清末高等学堂,改设大学预科;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取消大学经学科;大学设评议会为学校最高评议机构,各科设教授会,等等。这些意见均在民初颁布的《大学令》中得以体现。据蔡元培讲,上述意见主要来自他留学德国时的实际考察和体验。

民初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1913年形成的《壬子癸丑学制》是两项重要的改革举措。时任教育部参事、直接担任上述文献起草工作的蒋维乔有几段回忆,试摘引如下:辛亥革命成功,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方自欧洲回国,造余庐而请曰:去国多年,于近来国内情形殊多隔膜,望公相助为理,部中一切,事无大小,皆愿为我计划之。余亦以国家之事,非异人任,重以旧友情谊,慨然允之。蔡曰:今者天下纷纷,尚未统一,论及教育,应如何著乎?余曰:军事未毕,实施教育,尚非其时。不过帝制推翻,民国成立,前清学制,全不适用,且为天下诟病已久,不若于此数月中,先行草拟民国学制,一面颁发通令,于旧制之抵触国体者去之,不抵触者仍之,以维持现状。蔡亟称善。……余乃于未进教育部前,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高梦旦、陆费逵、庄俞等计议,草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计一十四条。携此稿偕蔡元培并会计员共三人,赴南京组织教育部。……于元年一月十九日颁发此项通令。〔11〕这就是在民初教育改革中充满反封建色彩并具有重大影响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形成经过,颇能说明留学生们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蒋维乔(1873—1958),江苏武进人,字竹庄,号因是子,早岁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广泛接触西学。1902年加入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教育会,旋任爱国学社国文教员、军国民教育会教练员及爱国女学校校长。后长期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教科书并主持商务印书馆所办的新式学堂。民国初年应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参事,负责草拟法令。关于《壬子癸丑学制》,蒋维乔回忆说:当时教育部之重要工作,即在草拟新学制。招集东西留学生,各就所长,分别撰拟小学、中学、大学规程,每日办公六小时,绝似书局之编辑所。……计临时政府三个月,而教育部之学制草案,亦于是时告成。〔11〕这份学制草案与1913年8月正式公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基本上无大出入。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民初的教育改革从临时性应急措施的实施,到根本宗旨的制定,直至学制改革的完成,留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次改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经由以蔡元培为首的一批富于革新思想、富于献身精神的归国留学生的努力得以实现的。

五、民初教育改革简评

(一) 适应政体转变是民初教育改革的最大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后,由蔡元培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教育改革,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看,其最大的功绩是适应了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的历史潮流。教育宗旨反映着国家的意志,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民初教育宗旨明确宣布取消“忠君”“尊孔”以及他对宗旨内容的深刻阐述,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从指导思想上划清

了近代新式教育与传统封建教育的界线。它的颁布和在实践中得以初步贯彻,至少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它使得“忠君”“尊孔”这两条封建教育最本质的特点永远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尽管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经过辛亥革命的涤荡远没有根除,尽管辛亥革命后不久,形形色色的“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又沉渣泛起;“尊孔教为国教”的呼声也曾甚嚣尘上,但以后的历史证明,在教育上掀起“忠君”、“尊孔”的大旗,已无法挽回封建教育的残局。“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的民主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第二,它使得中国教育界在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为教育理论、教育学说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既然“忠君”与“尊孔”都明确取消了,既然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将被“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新道德规范所取代,那么,一切从属于封建教育的旧思想、旧观念,以至于旧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受到全面怀疑、批判,一切新的教育学说、教育理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受到欢迎,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这种对封建教育的全面批判和对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宣传介绍的新高潮要到新文化运动以后才逐渐蔚为大观,但其源头却是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从民初的教育改革开始的。

如前所述,民初教育改革适应政体转变的努力也反映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壬子癸丑学制》以及许多具体的规章制度中,像人们所熟悉的废止小学读经,提倡男女平等、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禁止使用清末所颁行的教科书,废除学堂毕业奖励出身的制度,取消贵胄学堂等等,都体现出鲜明的反封建性。换言之,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高扬共和旗帜的社会氛围规定了教育改革的方向,而民初教育改革把适应政体转变作为最主要的任务,也反映了主持教育改革者深沉的历史感和高瞻远瞩的自觉意识。

(二) 关于民初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

与20世纪初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完全以日本为模式相比较,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在取向上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就理论(教育宗旨)层面而言,表现出力图摆脱单一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影响,而以欧美,特别是以德、法两国教育为取向的倾向,但在实践(学制、课程)的层面,却仍以取法、吸收日本教育为基本特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上讲,众所周知,发动辛亥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而同盟会的成员则是以留日学生和亡命日本的革命者为主体。辛亥革命后,留日学生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极大势力,在这样一个总体氛围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自然不能不留下时代的烙印。从教育改革自身进程考察,如前所述,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经由以蔡元培为首的一批归国留学生的努力实现的。而这一时期的留学潮流正处在两个阶段的嬗变过程中,留学生的出国走向和归国后的影响正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导致民初教育改革在取向上呈现较为复杂状况的重要原因。

蔡元培担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标志着中国教育取法欧美新阶段的开始。应该说,在1894年前的30年间,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发展是以“泰西”为取向的。且不说由欧美教会人士创办的成百上千所教会学堂在国人面前树立了可资借鉴的模仿对象,即使在国人自己办的数十所学堂中,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聘请了欧美人士担任教习。至于留学生的派遣,更是以欧美各国为惟一方向。甲午战争失败后的十几年间,在举国一致“以日为师”的气氛中,中国教育的取向则完全倒向日本一方。1907年,蔡元培赴德留学的初衷,是有感于“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为德国海尔伯脱派(即赫尔巴特派——引者)”(12 [p. 344])。即是说,他选择到德国留学是为直接到德国探本溯源。四年的留学生活,使蔡元培对西方近代文化教育有了深刻理解。作为清末为数极少的以研习教育为目的的留欧学生,蔡元培的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不是由于他的留学经历,而是因为他奔走革命,功劳卓著。但是,在留学期间所受的教育,所形成的哲学观、世界观,所培养的兴趣爱好,却在有形无形之中影响着他的言行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如前所述,担任总长后,蔡元培

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是学理色彩极重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文中反复论述的五育并举、培养完全人格 既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 ,也是他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理论纲领。五育之中 ,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世界观教育的提出 ,都可以在他的留欧生活中寻出渊源。关于实利主义教育 ,蔡元培说：“实利主义之教育 ,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 ,至以普通学术 ,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 ,而近日亦盛行于欧陆 [4] p. 131)。从中可见 ,就蔡元培个人而言 ,把实利主义教育列为民初教育宗旨之一 ,亦离不开欧洲留学的影响。

民初的五位教育总长中 ,有欧美留学经历者三人 :蔡元培、刘冠雄、陈振先。刘冠雄的专业是海军 ,陈振先攻读的是农业 ,且二人担任总长均属兼署 ,时间短暂 ,我们很难找到他们有关教育大政方针方面的言论。因此 ,可以假定 ,刘、陈二人对民初教育改革在理论层面的影响极小。五位总长中有留日经历者二人 :范源濂、董鸿祜。董鸿祜在教育部组建之初即被任命为承政厅秘书长 ,负责文书、会计两科的工作。以后教育部改制 ,取消承政厅和秘书长 ,设总务厅 ,以秘书行秘书长之职 ,董留任秘书。可以说 ,董鸿祜主要是负责教育部内部的协调组织工作和具体事务。事实上 ,遍查民国初年的有关教育杂志 ,几乎找不到董的议论文章 ,因此 ,很难说他对民初教育改革在理论上有何影响。五位总长中 ,除蔡元培外 ,只有范源濂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和主张。范源濂是清末较早的留日学生 ,戊戌变法时在湖南时务学堂受业于梁启超。变法失败后 ,追随乃师到日本留学 ,前后近十年。辛亥革命前 ,他已在学部担任过主事、参事等职。长期的留日生活和在学部的阅历 ,使他不仅成为一名干练的教育行政官员 ,而且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范源濂的教育主张中 ,最为时人和后人称道的是力倡军国民教育 ,军国民教育是 20 世纪初年由留日学生首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范源濂提倡军国民教育既是他个人的教育主张 ,也体现了留日学生在理论上对民初教育改革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 ,在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中 ,就主持教育部工作的五任教育总长而言 ,能在理论上提出自己的主张 ,并能对民初教育宗旨的制定产生影响的是蔡元培和范源濂。当然 ,范源濂的政治地位、社会联系、个人声望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 ,都无法与蔡元培相提并论。第二 ,在民初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中 ,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育、美感教育的提出主要受蔡元培的影响。而军国民教育的提出 ,则与以范源濂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的影响分不开。第三 ,就民初教育宗旨的总体而言 ,已经摆脱了单一的以日本为模式的价值取向 ,在融合欧美和日本影响的同时 ,更多地表现为取法欧美特别是德、法教育的倾向。

(三) 大发展中的不平衡

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有力地促进了这一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在历史所能提供的舞台上 ,为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演出了一幕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回味的活剧。但是 ,这次改革毕竟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二次革命”失败 ,前后还不到两年 ,时间是如此短暂 ;另一方面 ,这两年间 ,可以说战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而财政经济方面的拮据状况甚至比清末更严重。教育部本身运作所需经费尚要靠借贷维持 ,可以想像 ,中央政府对各地教育在财政上的资助是十分困难而有限的。上述客观环境必然要在民初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留下深刻的印记。

第一 ,对传统封建教育的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 ,制度层面的改革重于思想层面的改革。辛亥革命的暂时胜利 ,确实使那些为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实现民主共和理想而进行过艰苦卓绝斗争的志士仁人感奋不已。“民国成立 ,改革之目的已达 ,如病已医愈 ,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 ,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 ,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 [13] pp. 7 - 8)即认为政体转变之后的主要任务不在“破坏”而在“建设”。蔡元培的这一看法在当时具有非常广泛的代表性。应该说 ,就一般的历史进程而言 ,这一观点并没有错。问题是 ,这是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才有的大变动 ,没有广泛深

入的思想层面变革的支持显然是难以完成的。当时,恰恰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检阅民初教育部所颁发的种种布告、通令、通电以及时人的议论,可以看出,人们把教育上适应政体转变的努力更多地理解为制定颁布各项法令规章制度。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在教育部之意,亟欲整理全国教育,苟为教育上应有之事,无不制为新令,陆续公布。此令之可行与否或非今日急务,均不暇计,此教育部注重形式教育之讥所由来也。……根本改革尚不注意,则其他事务,改亦徒劳。〔14〕”说教育部不注意根本改革,有点言过其实,因为事实上一些改革举措在政体转变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批评改革偏重于形式,确是一语中的。如果联系到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民初的整个社会背景,应该说,这一缺憾既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也为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二,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实况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在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中,就数量而言,得到最大发展的依次是法政教育、实业教育和普通教育。1909年,全国各类法政学校有47所,学生12282人;至1912年,法政学校数增至64所,而学生数增至30808人。虽然学校的增幅仅为36%,但学生人数却增加了150%。在同一时期,实业学校由254所增至425所,增幅为67%,实业学校学生数由16649人增至31736人,增幅是90%。普通学校由51877所增至86691所,增幅为67%,普通学校学生数由1561674人增至2847574人,增幅是82%。

表面上看起来,攻读法政专业的人数猛增与民初政党林立、各种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人们的参政意识普遍高涨的社会现实有关。但是,这种过热的势头从整个教育体系的结构来看,又是畸形的、很难说是正常的发展。1912年,全国的专科学校共有111所,学生39633人,这些学校至少包括高等师范、法政、医药、农业、工业、商业、外国语等门类。而法政类学校即占总数的近60%,学生人数更占了78%。对于这一状况,时任江苏教育行政的黄炎培就曾撰文提出批评,称之为“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他说:“今悉一国之才与智,而群趋于法政之一途……供多而求少,已消耗多数人才于无何有之乡,而或劣者杂出其间乎!吾恐国家社会之蒙受祸害,乃且加厉,比其觉悟,而元气已伤,飘摇之国运,将与此如狂如醉之潮流,同不返耳。〔15〕(p.15)”事实上,这种群趋而习于法政一途的现象,从更深的层次看,毋宁说仍是封建教育的遗毒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1913年11月22日,教育部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为讲习所》的咨文中就曾指出:“近者县邑之区,纷纷设立法政专门学校……创办者视为营业之市场,就学者藉作猎官之途径,弊端百出,殊堪殷忧〔16〕。”

实业教育的发展从势头上看也是不错的,在校学生数比1909年增加90%,这与民初振兴实业热潮的出现有很大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形势也不容乐观。就整个教育体系的结构而言,实业学校数和实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与普通学校数和普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相比,前者分别仅占后者的0.49%和1.1%,这种结构与客观现实的需要是很不适应的。实际上,在民初的教育改革中,就最高教育行政当局而言,实业教育的发展较少受到关注,它的发展更多是由实业界人士的努力促成的。在上面提及的同一篇文章中,黄炎培把法政学校和实业学校比例不相称的现实作了对比后说:“今之论中国者,莫不以民多分利、少生利为致贫弱之一大患。习法政者所为事业,分利事业也,其趋之也如彼;农工,生利事业也,其弃之也若此。……夫吾非谓法政之不足习,而法政学之可废也。求学必求当世必需之学,教人必教之为当世不可少之人,然则何去何从乎?”另一位教育界人士陆费逵也曾主张以实利主义作为民国教育方针。但在当时,这些议论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实业教育的大发展、职业教育思潮的勃兴和职业教育运动的形成大气候,是在三年后才露出端倪的。

在民初教育改革中受益最大的是普通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不仅小学校数和在校学生人数有大幅度增长,而且在教科书编写、教学方法的改进等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民营出版机构闻风而动,组织力量编写了大批适应政体转变需要的教科书。1913年1月,教育部连续三次公布审定教科图书31种共129册,全部是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的教科书。清末从日

本传入的赫尔巴特五段法、单级教授法、复式教授法仍在各地小学试行,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蒙台梭利教学法等新名词也开始在教育报刊上出现,并引起教育界的注意。时人曾就小学教育状况评论说:“小学为教育之基本,不特教育家亟亟谋普及,政治家亦尽力提倡之,此我国年来之佳气象也。民国成立,国事尚在争执之秋,独小学教育骤见发达,有一校学生数倍于旧额者,一地学校十数倍于原数者,南北各省,大都如是,此又我国年来之佳象也。”〔17〕当然,短时期内小学教育的大发展也带来不少问题,如教师的短缺、经费的严重不足、教学方法的滞后以及程度的参差不齐等等。但是,就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而言,基础教育即小学教育可以说起步最晚,从1902年清政府大规模兴学中受到重视开始,到民国初年也不过只有十年左右的历史。民初小学教育的突飞猛进,从整个教育体系的结构变革来看,应该说是合理的。

[参 考 文 献]

- [1]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第1号[R].临时政府公报,1912.
 [2]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第4号[R].临时政府公报,1912.
 [3]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第4号[R].临时政府公报,1912.
 [4]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拟议学校系统草案[J].教育杂志,1912(3:12).
 [6] 蔡元培.自写年谱[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黄远庸.远生遗著 第2卷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 鲁迅.鲁迅全集 第7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9] 蔡元培.邀范源濂任教育部次长的谈话[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 蒋维乔.清末民初教育史稿[J].光华,1935(3:1).
 [12] 蔡元培.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 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庄俞.元年教育之回顾[J].教育杂志,1913(3:10).
 [15] 黄炎培.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A].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6] 教育部.通咨询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为讲习所[J].教育杂志,1914(3:3).
 [17] 庄俞.小学教育现状论[J].教育杂志,1914(3:3).

[责任编辑 徐 枫]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TIAN Zheng-ping, YANG Xia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1911 Revolution, which put an end to the regim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over-2000-year feudal autocracy in China, greatly propell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Led by Cai Yuanpei and his associat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iming at effacement of the feudal influenc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values brought forth the new aim and system of education. This not only laid a new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n guiding ideology and system but also substantial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n practice. As a result, the old unbalanced and unsound schooling structure was considerably improved and a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began to take shape.

Key words: the 1911 Revolution;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